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八五期 ——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3b)

【追根溯源】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二）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四）

戴 煌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追根溯源】

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二）

• 戴 煌 •

（续上期）

◇ 为了维护“神”的绝对权威，不惜将全党全国推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很多人认定，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而它的谋划，在1964年11月正式发出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前后就开始了。

就在那年的11月底，毛泽东针对其本人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下放指导“四清”运动的效果不明显，而刘少奇一个指示却有许多干部雷厉风行执行的情况，在一次会上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在那年12月15日起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及运动如何进行，毛泽东与刘少奇又发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断言：“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刘少奇则坚持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1962年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邀请部份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欢聚在一起过他的71岁生日。在这样的宴席上，他竟然也指责刘少奇关于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的提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使大家听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1962年2月28日，针对前几天会上同刘少奇的争论及会前邓小平好意为他节省时间精力，请其不必出席一般的汇报会，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上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我要求要有言论自由。”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当晚，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又一次批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做法。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

1月5日，在继续进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刘少奇的观点，并严厉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中央最高层一些同志的猜忌、不满、不信任已达顶点。为消除这一触即发的危险迹象，时任中组部的安子文受党内多数领导人之托，找刘少奇说：“局面已经非常严重了，千万不能跟主席（再）发生矛盾；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刘少奇为维护党的团结和毛泽东的威信，接受了这个好心的劝告，在中央的一次生活会上作了检讨，一再无条件地表示退让和服从。可是毛泽东仍然说他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决心清除之及其“余党”，不惜将全国再一次推向大动乱。

关于这次将全党全国推向灾难深渊的十年大动乱或十年浩劫，已有许多书籍和文章问世，本文只着重说明这几点：

这场浩劫，致造神运动登峰造极；

为了造神，对优秀文化和精英人才疯狂剿杀；

造神结果，既毁了国家民主法制和社会道德文明，又使物质文明徘徊不前，并扩大了腐败黑暗面，迫使亿万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

◇ 这场浩劫，致造神运动登峰造极

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大反彭德怀，林彪说了“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开始，他就一直高喊“紧跟、紧跟又紧跟”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当人们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进行批评、毛泽东也不得不暂作退让而检讨几句的时候，也是林彪首先跳出来为老人家解围，说什么“总路线”、“大跃进”等都是正确的，只是由于缺乏经验，死了一些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并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此后，每当毛泽东和他一起出面接见国内的一些人，在毛泽东讲话之后，他都要“紧跟”讲两句：第一是“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第二是“我完全拥护”。有时共同接见外宾，他也是这样“紧跟”。如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和齐奥塞斯库来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恢复友好，毛泽东表示：要和好，苏方总该有个表示，

先讲话，先作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应该由他们负。林彪赶紧在一旁说：“不，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九！”

正是在这1964年，他首先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语录》。在《语录》的《再版前言》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号召军队和全国人民大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辈子”。从此全国报刊就竞相刊登军队和地方机关集体和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迹和学习笔记、心得，“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实际工作之‘的’”。

“文革”序幕拉开和“文革”正式开场之后，林彪的表演更深得毛泽东的欢心。除在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大反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时不遗余力之外，他以中央副主席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指示全军突出政治，说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他给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立刻成了风行全国的口号。有人还据此编成全民皆唱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既然“万物生长靠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不落的太阳。那么，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的一切好人好事，就无不“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沈阳部队某部炮兵连战士刘英俊为保卫人民群众的安全勇拦惊马而牺牲，解放军报为此特发表社论，其标题竟这么长：《学习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学习》。毛泽东与林彪批准授于解放军某部六连四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给排长李文忠以“支左爱民模范”称号，解放军报的社论标题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是最大的公》，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爱民模范排’》。报导青年贺相魁扑灭山火而英勇负伤，人民日报也要牵强附会地做出这样的标题：《赴汤蹈火为人民——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贺相魁在扑灭山火和治伤期间的英雄事迹》。

总之，那时每天打开报纸，几乎都能看到如此这般的造神标题——《‘海上英雄艇’轮机兵麦贤得——毛泽东思想的钢铁战士》，《大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永远战斗在革命战线上——记双目失明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戴笃伯》，《纺织女工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心一意干革命》，《这里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李家庄团支部组织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杂技演员》，《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党员李全洲》，《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死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奋勇前进——记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靠毛泽东思想打开了聋哑‘禁区’——记3016部队卫生科毛泽东思想医疗队在辽源聋哑学校治疗聋哑病的事迹》……。报导我海军航空兵击落击伤入侵我国领海领空的美国舰载攻击机各一架，也要说这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取得的胜利。甚至于人民日报发表董存瑞的战友郅顺义怀念董存瑞的文章，也要标为《听毛主席的话，不断革命，彻底革命》；南方一些省发现了煤炭资源，也说这是“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打破了‘江南无煤’的谬论，北煤南运的状况正在迅速改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些文物，也说这是“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伟大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上海市水文地质工作者在控制地面沉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也说这是“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控制上海地面沉降”……。

总之，那些年不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新华社或其他任何大小报刊，每报导任何一项工作成绩和某一事业成就或召开某一会议，几乎都要前加“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或“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类套话，不厌其烦其烦。

这种夸大其词的“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的过份作为，显然是与毛泽东原来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至理名言完全相悖的，也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践的。没有广大人民与千百万革命者舍生忘死的英勇奋斗，只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怎能打出一个新中国来？再说，这雄才大略也是在广大人民和千百万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的实践中，才得以逐渐形成的。因此，当人们读了1965年8月26日人民

日报刊登的阎长林口述的回忆文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时，当年在彭德怀统率下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最终打败占领延安的胡宗南部队的一些老同志，就颇为不平地说：如果当时不是在胡宗南身边当上校秘书并深得胡宗南信任的我地下党员熊向晖及其他同志不断及时地传出机密情报，使毛主席他们对胡宗南各军师的行动甚至有时吃不上饭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哪能“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地把胡宗南赶出陕北？当然，他们当时只能私下发发牢骚，谁也不敢公开道个“不”字，以免与自己的老领导同遭厄运。

在这种极度神化和高压空气下，全国男女老少几乎无一例外地每天都要进行宗教式的“早请示”、“晚汇报”，人人都手摆《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有节奏地齐声山呼“衷心祝愿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为了向伟大领袖表衷心，全国亿万人纷纷跳起了“忠”字舞，“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接着又有人把这“三忠于”扩展为“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四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1967年11月，又出现了“大树特树”：“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人民日报等报头每天都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外，《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最高指示》，以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老三篇”等等大量出版发行。1967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导，当年出版《毛选》八千万部；《毛主席语录》三亿五千万册，《毛著选读》四千七百万册，诗词五千七百万册。1969年1月2日新华社报导：不到3年，《毛选》即出版1亿5千万部；后又报导说，毛主席著作与马列著作10年中发行48亿册，比“文革”前的17年增长17倍，全国各省市革委会向贫下中农、军烈属和城市“革命居民”免费赠送这些革命宝书，掀起了空前广泛的学毛著运动。

与此同步，赞颂毛泽东的歌曲日新月异：《毛主席著作闪金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万岁毛主席》，《太阳就是毛泽东》，《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见到了毛主席最幸福》，《值勤战士心向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天天读》，《工农兵永远爱读‘老三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好》等等，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响彻神州大地的还有为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谱写的各种歌曲。语录歌中有：《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分清敌友》，《造反有理》，《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等等。

为了适应中国的这种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在他们自己国家也习惯于造神的阿尔巴尼亚艺术团来华访问演出，也把毛泽东1961年11月初《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开头的一段话，谱成了《语录歌》，并用刚刚学会的那几句汉语领唱、齐唱、轮唱、大唱特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甚至于，毛泽东每说一句什么话，比如“要斗私批修”、“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革命委员会好”，等等，都被当作“最高最新指示”，首都机关、学校、厂矿企业都要带头结队上大街庆祝游行，哪怕是吃罢晚饭后才听到的，也要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地上街走一番，说是“贯彻宣传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把外国友人送给他的几个芒果，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也

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热情赞扬和坚决支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革命行动”；北京与外地无数支群众队伍抬着芒果大模型来回大游行，并高声呼喊“感谢毛主席深情关怀工农群众”、“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

与这些响彻大地的歌声和不分日夜的游行相适应，人人争相佩带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等语录章，家家户户张贴毛主席像；成套的“毛主席万岁”邮票广为发行；《毛主席是心中的红太阳》画册大量出版。甚至去商店购物或去邮局办事等等，都要先向柜台里面的售货员或服务人员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或“要斗私批修”或其他任何一句语录，对方也立即回应一句语录——就像基督徒、伊斯兰教徒或佛教徒们见面时，要说一声“主啊”、“真主啊”或“阿弥陀佛”一样——然后才能说购何物或办何事。如果去书店买一张毛泽东肖像，都不能说“买”而必须说“请”。如果一时心不在焉说漏了嘴，就可能惹来一个现场批斗会，说是“对伟大领袖不恭”，必须对着肖像“请罪”再三才能脱身。书店里如有更厉害的“三忠于”、“四无限”、“四不忘”的人，则会在你脱身之前对你拳脚交加，然后还要打电话给你所在单位，对你狠批狠斗。在批斗中如有积极捞取政治油水的人“揭发”你平时有过“消极不忠”言行，则可能给你扣上“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怕罪名，那就会像“林副统帅”所说的那样：“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不仅如此，争戴毛泽东像章也能争出“反革命”：单位来了一批像章，大小不一，轻重有异，而人人都想得到又大又重的，只好让大伙“抓阄”碰运气。有人抓到了最大最重最好的，别人恭喜他“真是好运气”，可他很谦逊，随口说了句俗话：“我这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这可就悲从喜来了！本人当年在山西劳改队中的一位难友的姐姐——太原一所中学的女教员，就为这句普普通通的口头语，立即被打成“别人不能重复那句恶毒语言”的“现行反革命”！

当时就有智者悄悄对人说：我们的民族太可悲了！优良传统与劣根性并存：既有人仁爱诚信、与人为善，也有人诡计多端、歹毒凶残，更多的人则奴性十足、愚昧至极——似乎一旦没有了皇帝就会天崩地裂！这个“瞎猫碰死耗子”式的“现行反革命”，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杀头大罪有何区别？！

可不是么？在新中国创建之初，有些农民分得土地过上了好日子，出于对毛主席的真诚崇拜与敬仰，把过去春节时贴在家里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改为“毛主席在此，平安无事”。一进入“文革”，不论农村与城镇，除了少数人仍保持这真诚而愚昧至极的崇拜与敬仰之外，更多的人则出于提心吊胆的恐惧，而不得不在“三忠于”、“四无限”、“四不忘”和“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声浪中随波逐流。至于腾飞于这种声浪之上去抢夺黄马褂的人，则另当别论。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们为取得毛泽东的更大欢心进而攫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极力把这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推向全世界。《‘五·一六’通知》后仅一个月，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社就鼓吹《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1967年1月11日，该报又登出通栏大标题：《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同年5月23日，北京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同年10月4日，报导毛泽东接见来自五大洲的各国朋友，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1968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37周年，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在1962年9月18日给来访的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该报为此特发社论，标题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中国派出的使节、专家，首要任务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为实现这种“雄图大略”，还把大量的毛泽东著作推向全世界。1967年6月7日新华社报导说，已出版了各种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同年11月24日又报导：“文革”一年，我国已出版25种外文毛主席著作共460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1968年6月5日又报导：《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军事文选》和《毛主席语录》又有14种外文版出版发行……

◇ 为了造神，对民族优秀文化与国家精英人才疯狂剿杀

在这狂热崇拜和竭力歌颂声中，凡被认为无助于“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有碍于造神运动的文化人与作品，多被列为“牛鬼蛇神”与“毒草”而统统打倒。其中先后遭难的有：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哲学家杨献珍及其“合二为一”论，罪名是“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对抗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论”；

著名作家赵树理及文学评论家邵荃麟等人及其“中间人物”论，罪名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对抗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长、后担任北大教授的冯定及其哲学著作《平凡的真理》，罪名是“对抗毛泽东思想的唯心主义大杂烩”；

著名作家、《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被骂成“戏剧界的祖师爷和反党分子”，剧本《谢瑶环》是“大毒草”，另一剧本《关汉卿》是“反党反革命”，“戏剧理论为封资修服务”；

著名作家夏衍及其作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犯下了“反党罪行”，其《上海屋檐下》是“反共卖国剧本”；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及其历史观“应当受到严厉批判”；

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及其作品和音乐理论，均“反党反社会主义”；

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是“反革命两面派”、“文艺黑线总头目”，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阳翰笙是“周扬死党”，“必须剥开他的画皮”；

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汉子”“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创作自由’的反革命口号”；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理论是“修正主义谬论”，是“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著名作家秦牧、沙汀、王愿坚等人都“贩卖资产阶级货色”；

著名画家黄胄则是“驴贩子”；

原文化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齐燕铭是“封资修代表人物”；

南京大学校长和校党委第一书记匡亚明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著名工农作家陈登科的长篇小说《风雷》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碑”；

著名记者、作家杜鹏程的长篇《保卫延安》是“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

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描写陶铸青年时代在厦门搞地下活动的《小城春秋》，也被说成是“美化盲动主义路线的破烂”；

甚至在1936年就已作古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章太炎，也被拿出来批判，要从他的“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的思想演变，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至于“文革”前的优秀影片与戏剧，几乎都被列入批判打倒之内：

影片《林家铺子》是“美化资产阶级”，

《不夜城》是“歪曲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

《兵临城下》“违反毛泽东军事思想”，

《抓壮丁》“同阶级斗争唱反调”，

《舞台姐妹》是“三十年代电影的借尸还魂”，

《红日》“效忠于阶级敌人”，

《逆风千里》“为反革命复辟分子鸣锣开道”，

《桃花扇》“是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

《两家人》是“大毒草”，

《球迷》是“射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支毒箭，反党文艺黑藤结出的一颗毒瓜”，

《怒潮》“为彭德怀翻案”，

《革命家庭》“宣扬革命盲动主义和革命悲观主义”，

《黑山阻击战》“诋毁人民战争”，

《五更寒》是“反动影片”，

连《战上海》和《东进序曲》也成了“诋毁人民战争的反动影片”……
甚至于，对解放前的《丽人行》、《万家灯火》等影片也进行了批判，
传统京剧《四郎探母》也成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叛徒哲学”，
《三娘教子》是“教子读经的黑标本”……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人民日报接连重新发表了毛泽东1944年的《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51年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4年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问题》、“文革”前不久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更进一步地掀起了对古今各种文化名人和作品的批判高潮。

这样，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泱泱大国，又进入了一个禁书年代。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令民间禁藏《诗》、《书》、《礼》、《易》等经典，违令者满门抄斩，到满清入主中华大地后对汉族书籍中一切有碍满清统治的内容严加删削，甚至大兴文字狱——就是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也文字狱不绝如缕，那些毕竟是封建王朝“孤家寡人”的独裁专制特色；而我们是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人民最自由、最民主、最幸福的社会，恰恰又重蹈了封建王朝的那种野蛮残酷的文字狱等等的覆辙，全国人民能够阅读的古今中外文艺作品几乎都被一扫而光。不甘于被强制愚昧的年轻人只能偷偷地、十分小心地阅读“除四旧”“除”出来的现、当代各家的小说、诗歌、科普读物，以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作品。一旦被查出，少年儿童还可能被“贵手高抬”，若是成年人，就会被扣以“四旧分子”乃至“教唆犯”的大帽子，后果难料。这真是强把全国人民推向广阔无垠的文化荒漠。

在这文化荒漠中，人们能够公开欣赏的，几乎只有“文艺革命旗手江青同志”“挂帅”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沙家浜》、《红灯记》、《海港》、《杜鹃山》，“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以及“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了。这当中，前八个节目被统称为“革命样板戏”，因此人们私下愤愤地说：“全国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

就这样，1970年2月10日人民日报还发表吹捧江青的文章，其标题就是《革命样板戏鼓舞我们奋勇前进》。同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8周年，将反复上演过不知多少次的样板戏又一次全部轮流公演。由于人们早就看腻了，从1957年“反右”之后又一直没有增长过分文工资，绝大多数人再也舍不得把艰难度命的钱往水里扔，各单位为避免招来对“旗手”不恭的大难，只得花公款买票动员大伙儿去剧场为本单位装装“门面”。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关怀社会文明和人类进步，是一切心存善良的知识分子的天性。可是，正当西方发达国家迅猛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文化、向信息高速公路大踏步迈进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却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在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时候，他又说：“华佗念了几年书？李时珍念了几年书？念三年书就可以当医生。医生不要留在城市里！”正是由于这些“最高指示”，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著名报刊先后发表了《藐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文化阵地》、《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在使用中改造技术人员》等社论和文章。1971年4月15日至7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会议纪要，更说“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样，在知识分子中，除了“紧跟”而得宠飞黄腾达或甘当奴才驯服卖力者外，绝大多数都成了排在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不论在机关、学校、厂矿企业，许多有真才实学和和实践真本领的，在人前人后都显得邋邋遢遢灰溜溜的，连已对我国核武器试制成功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此时都去西单菜市场排队买菜，上身穿件破棉袄，腰间系一根草绳。

同样，正该向科学文化高峰作冲刺的数以千百万计的知识青年，在伟大领袖的“上山下乡”的口令下，纷纷去“大有作为的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人宣传队进大学领导大学，以实现“工人阶级占领

一切上层建筑”，并说什么“工农兵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在这种没文化教育有文化、低文化领导高文化愚昧倒退的鼓噪声中，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都关闭了一些医院，连世界知名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护士也被“精简下放”了。其中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如呼吸道疾病防治高手罗慰慈先生，也被“下放”到大西北的山沟沟里，接受公社卫生院的“三红”卫生员领导。过去常给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人瞧病的著名医学家张孝骞等人虽被留在协和，然而更遭罪：张孝骞被造反分子没日没夜地迫跪抽打批斗，打碎了眼镜片，额头血迹斑斑，又被迫令与全国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刘士豪等人去楼道擦玻璃窗。他们都年老体弱、高度近视，突感天旋地转、景物模糊，刘士豪没能一把抓紧窗扇把手，从梯子上扑通一声摔了下来，直跌得内脏出血并跌伤了腿骨，躺了很久才能勉强拄着拐杖缓步。给党和国家几乎所有的领导人看过病的国内外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改革开放后是世界卫生组织顾问），虽然没有遭受多少皮肉之苦，但也被迫与刚出茅庐的小伙子大姑娘们一样“包片一对红”地成了“住院大夫”：为病人打饭、理床、送药、打点滴、擦地板、扫厕所、端屎端尿，送病人去X光室，推死人去太平间。

上海的一些文化人被组成“牛鬼蛇神队”，去郊区工厂劳动改造。当时已年逾古稀的著名文化人傅东华也身在“劳改”之列。他们夜晚回家，全被“勒令”乘电车时不得入座，而只能伸手够着横拉杆一直站着；尽管夜晚乘车人少，很多座位空着，他们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地死撑苦站着——“不知地狱里的青面獠牙们对新来的鬼有没有这种‘勒令’”，其中有人在内心里这样嘀咕着。

在对古今优秀文化的这种大围剿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对社会和历史作出过杰出奉献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各界专家名士的残酷迫害，使之遗恨无穷地走上了人生绝途。

在1966年4月16日至5月14日这一月之中，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高炬、何明、姚文元、林杰等人的文章，猛烈批判并诋毁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猛攻与邓拓关系密切的《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大骂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小黑线”，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在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当天，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又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辱骂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是一个叛徒”。这位秉性刚正，1930年18岁入党的老党员，在5月17日夜悲愤地写了《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于18日凌晨服毒身亡，成为那段黑暗岁月的第一位以死抗争的殉道者，终年仅54岁。

5月23日，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的才子田家英也自杀了！他1948年8月担任毛的秘书，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由于多年的亲闻目睹，他对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出尔反尔、理论脱离实际等作风实在看不惯，为此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就受到冲击，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及当年秋天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更遭到毛泽东的猜忌与冷落，严厉地批评他的“包产到户”建议与活动，还声斥“田家英把持政研室”。1966年5月22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等人到中南海“勒令”他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便悬梁而死，终年仅44岁！

跟着，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也是因为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参加田家英率领的湖南调查组，积极反映湖南农村在三年大饥荒大死亡的实情，受到毛的冷落，“文革”一来就遭到猛批猛斗而愤然自戕。

接着，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被中宣部造反派批斗时，并非中宣部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特地跑来参加批斗，胡说姚溱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姚溱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诽谤与污辱，当晚悬梁自尽。

6月20日，历史学家李平心自杀。这位190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学者，1946年39岁时与马叙伦、许广平等著名人士筹组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颇有建树，“文革”前夕即遭围攻与迫害，运动开始后自杀身亡。

8月24日，国内外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先生，因不堪批斗迫害，极为悲愤地投入北京新街口豁口外的太平湖自溺而亡。

同日，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的陈笑雨——笔名马铁丁，因不甘屈辱于残酷批斗，投入卢沟桥附近的永定河段自尽。

9月3日，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自缢身亡。他是著名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的学生，1927年16岁时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期相继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和《考古通讯》杂志副总编辑，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并有颇多创先之作。

9月11日晚，著名京剧、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自杀身亡。她是京剧大师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文革”开始后，迭遭批斗殴打，精神肉体均受到深巨伤害，自杀前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终年47岁。

刘盼遂，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受教于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70岁自杀身亡。

叶以群，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身亡。

闫红彦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委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于1967年1月8日凌晨服安眠药身亡。死前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终年58岁。

李立三，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1967年夏天，在两个月中遭受14次残酷批斗殴打之后，于6月22日晚服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了“致主席”书，终年68岁。

陈琏，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之女。1939年20岁时背弃其名门贵族之家而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不然她为什么要离开那样富贵的家庭而参加穷苦人的共产党？”1967年11月19日，她从11层楼上跳楼自杀，终年才48岁。

赵慧深，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而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份不好而屡遭批斗，又因曾在解放前的电影《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与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终年56岁。

罗广斌，毕业于西南联大，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写了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红岩》，“文革”伊始就受到残酷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时仅43岁。

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而闻名天下。“文革”一开始就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肚子里还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而屡遭批斗，于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年仅37岁，死后还被剖尸检查那无中生有的“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容国团，著名乒乓球高手。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为祖国赢得了美誉，

“文革”中却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和“‘三名三高’的尖子”受到了批斗。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对国家体委领导人贺龙元帅和荣高棠的侮辱人格的批斗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而死，年仅31岁！

著名作家杨朔，抗日战争初期就是八路军总部派往晋察冀战场的记者和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写过《荔枝蜜》等传世范文。“文革”开始后，他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他要求上书毛主席和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严厉拒绝，在绝望中于当年8月3日服安眠药自杀，年59岁。

以所谓“党天下”被定为“右派”的储安平，解放前主持《观察》杂志，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丧权辱国作过猛烈抨击，解放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1957年被定为“右派”后，“文革”中再次成为被折磨的对象，造反分子们对他任意打骂与人身侮辱无所不用其极。他不忍屈辱，于1968年8月投河自尽，年59岁。

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译等身。他在1957年3月应邀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录音，兴奋地对人说：“共产主义者遍天下，毛主席真是千古一人。”但在紧接着的“反右派”运动中却被打成“右派”。1968年8月30日开始，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又被揪到大门口站长凳戴高帽批斗，遭人格凌辱；9月3日，夫妇双双自缢而亡。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维吾尔族，有《中国史纲》等18部大著行世。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越南胡志明主席在广西边境落入国民党军警之手，他遵照身在重庆的周恩来的密示，通过冯玉祥与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游说，将胡志明营救出狱。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革”中横遭批斗，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曾在解放前的《乌鸦与麻雀》和解放后的《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因不堪迫害于1968年跳楼自杀，时年48岁。

著名作家周瘦鹃，解放前曾主编《申报·自由谈》和《礼拜六》等，发表过鲁迅先生的许多文章，自己也有长篇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井自杀。

著名作家李广田，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和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后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书，“文革”中惨遭迫害，于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被毛泽东选作“文革”第一个突破口、被姚文元们连篇累牍地批判而遭到残酷批斗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解放前28岁时就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响应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陆续写出《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作品，没想到这却被毛泽东认作是为彭德怀翻案而遭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终年60岁！

著名电影艺术家顾而已，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和《天仙配》等影片，因30年代与当时艺名为蓝萍的江青有过交往，了解江青那一段丑恶历史，在“文革”中就备受迫害，于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的门梁上自缢身亡，年55岁！

著名记者和新闻学家范长江，1936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达陕北，向全国报导了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引起巨大反响。1938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起并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记者为国家的民主自由而斗争；同年发起和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向国内外报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香港与邹韬奋等人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转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苏皖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和《新华日报》社长；国共和谈时，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解放战争中任新华总社总编辑；解放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国家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因不堪迫害于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年61岁。

著名记者、作家和诗人闻捷（原名赵文节），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新华总社文教编辑、中国作协驻会作家。其诗作《吐鲁番情歌》获广大读者赞扬，“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又因人际交往问题横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被正式委任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闻捷不堪迫害，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

版本目录学家和敦煌学家王重民，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在目睹引发全民族深重灾难的“文革”浩劫无休无止，在极度忧痛中于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在这场浩劫中，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极端悲愤绝望中自杀身亡者难计其数，单是在我们新华社的总社大院内，就有十多位老记者自杀，占总社当时新闻业务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一强。其中有驻外记者许复己夫妇、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夫妇、先后任国际部第一副主任和外事部主任的李炳泉：许复己解放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任新华社九兵团分社记者，曾随九兵团首先入朝参战；朝战结束后调任总社国际部编辑，不久被派驻国外。“文革”开始横抓“叛徒特务”时，这位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也被诬为“叛徒特务”而被残酷批斗。他不甘屈辱，夫妇双双吞安眠药自杀。

陈正青在抗战伊始就投身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与后来著名于世的作曲家周巍峙为同窗挚友。建国前后，他一直在新华社从事摄影报导，拍过大量珍贵历史镜头。“文革”伊始，不堪凌辱，也是夫妻双双服安眠药自杀。

李炳泉于抗战中期即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奉命打入傅作义的报纸《平民日报》任采编主任。他的一位兄长是傅作义部队的高级军官，故李炳泉与傅作义的来往密切。1948年冬北平被解放军铁桶般围困时，李炳泉的兄长劝说傅作义“要深识大局，尽快与解放军谈判和平起义，定能成功”。傅作义再三追问这“成功”有何把握时，这位兄长才透露自己的弟弟李炳泉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希望傅将军和平起义的意图就是李炳泉奉地下党之命，请他这位做哥哥的转告傅将军的。傅作义听罢大为感叹：“没想到踏破我家门槛的炳泉先生竟是共产党！”当李炳泉以中共党员身份与傅作义面谈，傅作义再次发出上述感叹时，李炳泉笑着说：“您的女儿傅冬也是我们党的一位忠实可靠的同志哩！”傅作义一听更为感叹与震惊。随后，李炳泉带着傅作义的一位贴心代表，出了北平城与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联系谈判事宜，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解放后，他就进新华社任国际部副主任，后又改任外事部主任。“文革”开始，新华社的造反派硬说他是“叛徒特务”，“与国民党军队有着不可告人的干系”。他多方说明解释也无济于事反而遭到更加凶残的迫害，遂在宿舍楼地下室的锅炉房里悄悄服安眠药自杀，两天后才被人发现。

悲愤绝望而自戕者如此之多，而被迫害或抑郁难释致死者就更多了！其中重要人物或知名人士有（其后括号内年月日为死亡日期）：

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
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1966年），
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年），

文学评论家、《革命家庭》作者陶然（1966年），
小说家孔厥（1966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同年12月16日），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6年），
参加过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南汉宸（1967年1月），
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贾拓夫（1967年），
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1967年），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1967年），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7年），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1967年），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1967年），
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1967年），
全国人大常委、鲁迅夫人许广平（1968年3月3日），
新闻界著名人士、原《文汇报》社长金仲华（1968年4月3日），
对江青30年代的丑闻知根知底的电影艺术家、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
革命戏剧家、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1968年12月10日），
原24军政治部主任、小说家、后被诬为“胡风分子”的彭柏山（1968年），
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1969年），
原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交通部长、“右派分子”章伯钧（1969年5月17日），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1969年6月9日），
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1969年11月30日），
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张学思（1970年），
著名作家赵树理（1970年），
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71年），
文学评论家侯金镜（1971年），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72年），
教育部部长何伟（1973年），
监察部部长钱瑛（1973年），
彭德怀元帅（1974年11月29日），
著名作曲家马可（1976年7月27日），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郭小川（1976年10月18日），
著名作曲家、《解放军进行曲》的作曲者郑律成（1976年12月7日），
以及德高年劭、我们大家都敬爱的朱总司令（1976年7月6日）、
张闻天同志（1976年7月1日）和周小舟同志（1966年），等等，等等。

至于浩劫中落难的人数更多得惊人而难以统计，其中单是因“刘少奇案”受株连被判刑的就多达两万八千余人！

在这里，应特别写一写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之死——

1969年秋，在林彪战备的“一号命令”下，中央各机关的“不可靠”分子纷纷被遣送去外省市农村的“五七干校”，各劳改单位的“劳改就业”人员家在京津沪三大城市者，也被押送到山西等地的劳改场所，家在其他省市的则被押回原籍“消化”。在当年10月17日，生命垂危的刘少奇也被“疏散”出首都，但不让他回其故土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石炭子冲，而把他押送到河南开封，负责看守的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等人拒绝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医疗条件。不到一个月，即11月12日凌晨4时，少奇同志即停止呼吸，终年71岁。

“病历”上写道：“该犯除患有支气管炎、慢性气管炎和轻度糖尿病外，主要病症是肺炎。”14日，少奇的遗体被放在木板车上拉向火葬场，一双瘦骨嶙峋的光脚还露在破毯子外面，以“烈性传染病死者”被秘密火化，火化单上填写的姓名是“刘卫黄”，职业是“无业”；骨灰盒上的姓名也是“刘卫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近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竟被摧残得饮恨长眠时连自己的真实姓名也被篡改了！好在他临终时留下一句大彻大悟、颠扑不破的箴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彭老总，自从七千人大会结束写了八万言的申诉书石沉大海之后，就继续在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8号吴家花园小院内种菜种老玉米。1965年11月，他奉毛泽东之命到西南“大三线”搞战备，但万万想不到：一个名为“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也正奉毛泽东之命加紧审查他的“罪行”。因此就在他泼出老命地跋山涉水到处巡视大三线的厂矿工地时，《五·一六通知》下达了；不久，他就被北京来的“红卫兵”揪回北京批斗，常常被一根麻绳套着脖颈并背缚着双手，还被紧拉着脖颈后的绳头，强令他低头曲背地站在批斗台上，任人打骂凌辱。有时还与张闻天同志一道被绑在大卡车上在长安街上游街示众，而且这种残酷虐待的批斗接二连三，一个月内多达20多次！1967年1月1日，他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我已于（67年9月）27日（被）押回北京，现被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

当然，毛泽东根本无需他这位已成阶下囚的昔日战友、同志与老乡的敬礼，而不予理睬。1974年11月29日，这位开国元勋因不堪长期的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在解放军总医院被严密看守的病房中含恨离开了人世！

张闻天，在庐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两项大帽子之后，尽管仍被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桂冠，但看不到中央文件，更不准参加中央任何会议，什么工作也不让做。经他自己的努力争取，才获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做了个“特约研究员”，“文革”中被批斗囚禁了一年半。

1969年，也是在林彪备战的“一号命令”下，他被“疏散”到广东肇庆，“勒令”其不许使用“张闻天”的真名，而被化名为“张普”，存款也被冻结，不能取用。但他有多年的心脏病，全身浮肿，面色灰白，多次上书争取回老家上海而一直未能获准，直到1975年8月才让去无锡定居。1976年4月，张闻天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惨遭镇压的新闻时，心脏病突然复发，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对夫人刘英说：“……别的倒没什么，只是（庐山会议之后）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并一再叮嘱：“我死后，请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197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下午7点30分，张闻天与世长辞。中共江苏省委立即向中央汇报，请中央派员主持丧葬事宜，同时提出这样的建议，“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追悼会”，而且还报送了一份追悼会讲话稿，其大意是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对这样的报告，尽管还说张闻天是“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不是作为党的总书记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也延误到张闻天逝世后的第八天，中央才给江苏省委作了复示，否定了江苏省委的召开追悼会的方案，只让省委和无锡市委各派一名负责人及少数工作人员向遗体告别，然后将遗体火化，骨灰盒放在无锡市公墓，由江苏《新华日报》发这样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3岁”，如此而已。

当年7月9日，张闻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凄凉的氛围中草草进行。与张闻天风雨同舟数十载的伴侣刘英敬献的花圈上，按照“上面”的指示连张的全名都不许写，而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7月13日，《新华日报》在第三版右下角、读者们几乎都不会注意到的位置以“本报讯”登了那条新闻，中央各报刊一概保持缄默，只

当没有这回事！不过这比起“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庐山反党集团首领”彭老总来，也算是伟大领袖的“网开半面”了！！

周小舟同志，1931年（19岁）“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日寇魔爪已伸向华北的时候，他担任北平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领导工作，参与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转到冀中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建国后，历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南军区省委常委等职。在庐山会议上被诬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后，一直没有承认所谓的“反党错误”。1966年“文革”一来，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54岁。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四）

• 周孜仁 •

（续上期）

七，新年的花絮

历史上任何震撼世界的大革命都有它的华彩段。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有他们的1793年，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有他们的1918。在这种史诗年代，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必然格外复杂和惨烈，这样年代的故事必然异常悲壮动人，这样的年代必然英雄辈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和法国大革命及苏俄十月革命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作为动乱的先驱：学生，仅仅是奉旨造反。如从若干社会活动的表象看，文革中确有很多与前面两场革命相似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年轻人所表现出的机敏才智和勇敢无畏确也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但是必须指出：催生这些英雄故事的政治平台，即人们所拥有的权利：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都是最高统帅钦赐的。只要最高统帅哪一天不高兴了，将这些东西一旦收回，不可一世的“天兵天将”们便什么也办不成了。1967年，最高统帅还高兴着哩，他还需要娃娃们继续大闹天宫，还想让他们锻炼锻炼，哪怕动刀动枪动炮。他很轻松地说一句话：你们要打，就象重庆那样，双方几万人，开大炮！伟大领袖赐给了这么大的自由，1967年还能不精彩吗？1967，是中国文革的华彩段。

在1月1日出版的《815战报》上，我撰写的“元旦献词”记录了重庆大学造反学生新年伊始的洋洋自得：“一九六七年，我们要砸烂黑市委，直捣西南局，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我们要清算八二八的老帐，讨还一二四的血债……一九六七年，我们在大破李井泉、黑市委的修正主义统治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我们要踏遍蜀水巴山……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西南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同一天的《815战报》还破例，同时出版了一期画刊。画刊上的几幅木刻版画，均为四川美术学院两位学生的大作。其时，二人被我们礼聘为美术编辑。一名邹昌义，现为“川美”绘画系教授。他在文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绘画才能，而是有一天他全副戎装来找我。时间是1967年的8月。他气喘犹急，很有些开心地对我说，他们刚刚开着坦克去“敌占区”示威回来。他头戴钢盔，腰间挂一柄枪：像是手枪，可枪口粗硕惊人。我正奇怪，他却快活一笑，爽快地将枪递过来，说：是打信号弹的哩！没手枪，只好用这个对付对付。几十年后久别重逢，见到我，他还像当年那样亲热地大呼：“狗X的周孜仁！”。另一位叫毛世勋，文革造反，名字也就革成了“毛峰”，并一直沿用至今：只是多彩的人生已经在他的名字前面积累了许多让人惊羡的头衔：报社副主编、大学客座教授、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等。文革那会儿他们都刚出世道，极朴拙忠厚的。为方便他们创作，报社专门开车到四川美术家协会免费弄来了许多梨木板，这让二人非常开心。梨木板宽平细腻，当是刻版画的上好材料，对于两位穷学生，绝对是梦寐以求的极品。木板原来的所有者、美协的版画大师们极不情

愿地看着我们把宝贝木板一块一块搬上吉普车，心里肯定极端难受。画家们认真地叮嘱我们小心，别把板子碰坏了，还一再说明这些东西来之不易。我注意到木板上，有的已经用铅笔起好了草稿，遂想：如果不是文革，板上的这些线条和块面一定已经印上全国一流报刊的显著版面而被推崇备致。六十年代，四川美协的版画水平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还上中学，我还做着画家梦的时候，李焕民、吴凡、牛文、徐匡、吴强年……这些显赫的名字都是我心中的泰山北斗。但是那一天，看见画家们一个个无可奈何地站在那儿，眼睁睁看我们把东西拿走，我没有把他们和上面那些名字一一对应。我已经不关心他们谁是谁。还有，看见画家们悲悯的表情，我是不是有点做贼心虚？木板装车完毕便一溜烟开走了。我想我们当时一定很像保守派传单上骂的“土匪”、“暴徒”：虽然我以为我们很客气。

1967年一月，市委和他们组织的“保皇派”，因为一个月前发生的“12.4”大武斗，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重庆市委事实上已经瘫痪。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而事实上也什么都不能干了。面对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工人纠察队还想做最后一搏：但已经毫无意义，无非是他们尴尬政治使命结束之前的回光反照。

下面摘抄的是一位同学当时的日记。他叫侯念平。重庆大学机械系三年级学生。毕业后曾分配云南边疆工作。70年代调回老家，临行前路过昆明，很珍重地把保存完好的日记本送我了，他说：留着吧，以后写文化革命历史，你用得上的。1967年初，他们班被派往长安机械厂“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该厂就是现在制造“长安”牌汽车的著名企业。很大，文革那会儿，它专业制造武器。这些日记，算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段实录：

“1月3日：今天下午长安厂举行干部大会，学习《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黄顺义代表重大815战斗团上去讲了一些话，谈得挺尖锐，但不怎么突出重点，信口开河，有一些赤卫军派人物感到难受就退场了。”（笔者注：黄顺义是重大815的著名“勤务员”。他的著名，更是因为他的勤勤恳恳和仗义执言。因为勤恳，在同学中素有“老黄牛”的美誉。而他的仗义，使他在政治谋略方面恰恰显得缺乏理性，甚至有些无知。在总团领袖里，我一直以为他代表的，是一种更为本色的良心和过于纯真的激情和勇气。）

“1月4日：……从1月3日起我调换了工作岗位，并且开始实行半天劳动半天搞文化革命的时间制。原来的8小组群众动得比较好了，现又调到1小组去……现在时间很紧，上午劳动，下午搞传单、大字报。今日又帮助《九一》钢铁战斗队整理材料……生活紧张，但是愉快。”

“1月5日：今天上午学习《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小组要我读，于是我边读边讲，结合自己通过几个月文化革命的感受，及了解的情况，讲了一下。这篇社论写得好极了，无处不谈出了我们心里话，特别是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再次明确地指出了出路。对受蒙蔽的群众给予了很大的教育。现在来厂劳动的学生越来越多，有造反派也有老保……联络站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进厂区看大字报……”

“1月10日：……近几日，重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即原工人纠察队开始大肆活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继续欺骗、蒙蔽一部份群众，企图为之保驾。……九日晚厂里发生由于一辆可疑宣传车被扣而调动大量战斗军企图制造冲突。并且一小撮垂死挣扎的混蛋企图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煽动部份工人罢工。昨日、今日，好几处地方停工。我厂战斗军今日也进城去了，聚集了上万人在两路口一带堵断交通。想抄造反军总部，至今而返。”（注：笔者当日日记也有“罢工达到高潮。几十万工纠在市内包围造反军总部，我们发出呼吁书并奔赴最前线宣传抓革命促生产”诸语。）

“1月12日：今天与另一同学参加了24车间的批判大会。车间指导员死顽固，在铁的事实面前大出洋相，给保守派极好教育。一个前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在铁的事实面前觉醒了，揭发了许多问题……”

“1月13日：我们车间今日也开批判大会，会开得比较好……”

“1月14日：今日全厂召开批判厂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开得较成功，会后，造反派一举接管了电台（广播站）、印刷所，让这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的工具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一切权利归左派。……”

今日我们车间一些人去红岩 8 3 1 参观，我和刘云生作 8 1 5 代表前往。同行的有车间主任、管理员、老师傅及造反派共 2 0 余人。”

“1 月 1 6 日……今天，我 8 1 5 战斗团采取了革命行动，一举接管和砸烂了设在重大的一切保皇机构……战果辉煌。我参与了砸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行动。我们挤开了用床、沙发等物抵着的愿专家招待所的门，冲入房内，又把挡在楼梯上的工人战斗军拉下来，冲上了楼，一举攻占了他们的司令部……我们总共缴获了黑材料、数十万张纸、油印机、油墨、喇叭、电子管、麻饼、香蕉、造谣传单、广播机……。这个行动，大长革命造反派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晚上我们通过对重庆黑市委的通令，勒令以鲁大东为首的黑市委 1 8 日晚 1 2 点以前到我校报到，2 3 日公开向全市人民做检讨，否则格抓格斗勿论，并勒令解散市文革（笔者注：“通令”发出后，副市长段大明、候补书记丁长河、书记处书记廖苏华、书记处书记鲁大东确实均次第按时报到，分别安排在各学生寝室住宿，由专人监管。事后检点，只有书记处书记岳林缺席，他已被交通学院 9 1 5 战斗团的造反派们提走了。）

交院 9 1 5 擅自抓走岳林这件事，显然是对重大 8 1 5 权威地位的公然蔑视。蔑视重大 8 1 5 权威地位的，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交院 9 1 5，而是整整一股正在暗中崛起的政治势力。他们雄心勃勃、摩拳擦掌，下决心要在即将开始的全市夺权中重新洗牌，和重大 8 1 5 及其附庸决一雌雄。这股力量的代表是：黄廉为首的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 8 3 1 纵队和交院 9 1 5 战斗团。他们背后，是来自天子脚下的首都一司和三司的驻渝联络站。重大 8 1 5 从来就没有把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御林军看在眼里，对于他们的指手画脚从来置若罔闻，这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下决心要让这帮“土老财”知道“中央来人”的厉害。还有，后来几乎主宰了整个四川命运的四川大学 8 2 6 战斗团，对于重大 8 1 5 这个山城地头蛇气焰嚣张地跑去省会成都招摇过市，也甚感愤愤。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反对派一边。最后，大名鼎鼎的罗广斌不正带领着“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坚守北京吗，1 2 月 1 7 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上他已经出够风头，正信心十足地等待中央首长接见，面授锦囊呢。

只是没有时间了。全国性的夺权已经进入倒计时。罗广斌实在太缺乏耐心。事实上，和他同样落魄的“受迫害干部”而后来险些儿真当上“四川王”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当时的情况和他也差不多：老婆带着几个随从在北京做报告、造舆论、拉关系，老公则呆在四川和红卫兵接应周旋。“二月逆流”狂飙骤至，老公见事不妙，乾脆星夜出逃，也躲来皇城根儿暂避风雨了。权威材料介绍：夫妇二人留京期间，共作“控诉”报告五、六十次，听众三十多万人。报告会的主办单位包括：中央办公厅下属某单位、中央监委、新华总社、《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等等。还有组织特别为他们出版张西挺《狱中日记》，细说李井泉、西南局对夫妇俩的迫害如何残酷，以及夫妇二人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高风亮节：事后曾有许多人对“日记”的真实性深表怀疑。不过，该“日记”即使千真万确，其名气和影响与《红岩》相比，也绝对相差着好几个数量级。但夫妻二人的优点就是能等——这相当要命——而他们确实等到了舆论造足，等到了上层关系攀的很可以，等到杀气腾腾的二月镇反不仅结束而且挨了中央狠狠一顿，时来运转，二人这才风光无限，得胜凯旋。政治斗争是极端需要耐心的。王莽谦恭下士，刘玄德后园学圃：中国古代的政治家、阴谋家早就在韬晦之策方面提供了许多经典模式。而罗广斌，毕竟文人一个，连起码的知识都不懂，还能成什么气候呢？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罗广斌的个人命运里，算是不幸言中了。

1 月 1 1 日，罗广斌等人从北京匆匆忙忙回到了重庆。其时，所谓“1 2 4 惨案烈士”这一情节已经被证明纯属虚构。事实是，从一开始筹办所谓 1 2 4 烈士尸体展览，重大 8 1 5 一伙“右倾分子”就表示了坚决反对。当时罗的决心是很固执的，他坚持要办起来再说，用这个来发动群众，又让群众通过展览来辨认。假烈士尸体的童话既已戳穿，已经够被动了，企图取代 8 1 5 地位的所谓“联合指挥部”又被砸掉，还有，即使尸体事实成立，罗广斌离开重庆这一个月功夫，文革闹剧已经又交给山城老百姓更多精彩话题，“1 2 4 惨案”所引起轰动效应已经好景难再。公众的灯光总喜欢投射在 8 1 5 这个幸运儿头上——完全可以猜想，出现在罗广斌面前的 1 9 6 7 年岁初的重庆，实在有点让他焦头烂额。好在还没有回来之前，1 月 6 日，首都三司、一司渝办、工人造反军、西师 8 3 1 和交院 9 1 5 等代表，已经在牛角沱客运站急会密商，统一了斗争策略：就让重大 8 1 5 去对付老保好了，我们就反反他们的“右倾”。在中国，反右总不会错，而且总是很愉快的。三天后，



1月9日，川大815战斗团驻渝办先行发难，召开大会批重大右倾。初试啼声，虽然未一鸣惊人，甚至被蛮不讲理的重大815造了反，但毕竟摸了一回“老虎屁股”，毕竟表示了自己的存在，胜利不小了。罗广斌回渝当晚，立即在市文联召集上述弟兄聚会，商议继续“反右倾”、“踢开重大815”、由工人造反军主持全市夺权诸事宜：造反派内部倒815的程序从此正式启动了。

对于这些个活动，重大815压根儿就没看在眼里，无非是几个苍蝇碰壁。仔细检阅1月27日以前的所有报纸，看不到任何关于反对派活动的消息，以及以总团名义的表态。只是在1月14日“关于山城八一五派中一些问题《815战报》答群众问”中轻描淡写地说：“有的人，他们俨然以‘当然左派’自居，瞧不起群众，到处指手画脚：这个组织‘右’，那个组织‘修’，惟独老子最革命，以‘永远的少数派’为自豪，孤家寡人，个人突出；有的人，他们热衷于仅仅拼刺刀，猛冲猛打，但是到运动深入到了要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今天，他们却不愿意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严肃的政治斗争，只想冲个痛快，闹个舒服。”尤其奇怪的是，不管多热闹，到1月27日，战报第八期出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便突然终刊了。这情景有点像古代将军在得胜凯旋路上，偶遇了几个打家劫舍的绿林小勇，他根本不屑一顾，虚晃一枪，便绝尘而去。

为什么突然停刊？具体细节我现在已经想不全了。至少作为我自己，象是以为革命马上就要成功，应该亲自投身其中，而不应该再坐在静静的编辑部消磨日子，这是肯定的。在1月24日日记上，我这样写道：“满街都是老保们戴高帽游街。形势发展很快 / 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已经展开 / 毛主席指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造反派 / 八一五的同志们还有什么心思坐下来整风？不行了，杀出去，夺权！夺权！夺权！我们革命造反派想的是夺权，说的是夺权，干的，也是夺权！ / 整风暂停，大家又杀出去了。 / 我真不想坐在编辑室里，人都憋死了！”前二日，即北京正式号召全国夺权的22日，日记记录我曾经“到八一印刷厂去（笔者注：报纸创刊后发行量增加很快。开始大约为2000至3000，不久便增至10000多甚至20000。重大自身印刷厂的能力不够，从第五期起就改在位于捍卫路的八一印刷厂印刷。从印刷质量来比较，第五期及以后的报纸明显比前四期好得多），顺道去南岸，今天在城里逗留一会，晚上回来了。”日记写道“解放碑又是水泄不通。正在开大会。什么大会呢？老题目，新内容，就是那个八二八。现在很多所谓的受害者都出来倒戈了，成立了‘八二八兵团’，到解放碑开控诉大会。所谓神医季开阳等等，均被抓上台挂以黑牌，冠以高帽，实在狼狈不堪。”

所谓“八二八惨案”，是重庆市委为对付刚刚起事的815而编造的一个非常吓人的谎言。说是重大815的学生，在1966年8月28日那天，围攻了江北区下横街小学，把女教师的衣服剥光、头发拔光，游街示众。还有，他们用两块门板，把一个驼背老师夹在中间施压整型。还有，有个老师被打成“脾破裂”，应该是不治之症了，后经季开阳大夫救治得以劫后余生。在民风朴拙的当时，这些恐怖故事是很容易不攻自破的，可815毕竟刚刚出道，面对漫天流言，一时间确被搞得惊慌失措，甚至不得不数千人星夜北上：去北京，找救星。时间是9月3日，学生们绝食两天对市委以示威胁，未果，以困乏难耐之身，徒步行走数十里方得上车。其情其景，确有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的悲壮。仅仅几个月工夫，事情就完全翻了个个儿。当时我们的高兴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在那一天的日记里，我惊异地发现还有这么一段极为仓促的记录：

“在大街上，人的海洋里，我看到一双特别熟悉的眼睛和那张白的面孔，是她——就是过去‘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的那位姑娘。她正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很久没见了。久别重逢，砰然一震，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心里老不平静。真的，太平静了！”

在满纸激言奋辞的日记中突然跳出这些纯属私人情绪的话，实在有些唐突，也说明这个女孩在我生活中的重要。请读者原谅我需要费些笔墨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我既然无可回避地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产儿，我所有的生活理念、行为方式甚至最隐密的私人情感，都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胎记。我是把自己也作为一具标本的。我解剖自己，也是对我们曾赖以生存的时代的剖析。

在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说里，我这样记录了我和她的初次邂逅：

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大一。大学一年级下期。夹竹桃鲜花盛开的季节。那年我十八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校园里夹竹桃极多。花开时节，红白相间的花枝就蓬蓬勃勃，洪水一样往道路中间汹涌，本来就拥挤的校园小路，就越发拥挤了。

命运注定我要和她窄路相逢。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在哪个系哪个班，尤其糟糕的是，在比肩接踵的人群里，我们每天相逢，匆匆邂逅刹那，我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偏偏要向我微笑？目光如电，总让我心跳难平。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寂寞的夏日的午后，我记得我曾在长满青稻的平原上踽踽独行，倏忽间初雷乍起，我蓦然回首：在遥远又漫长的地平线的上头，在充塞天际的浩瀚云团中间赫然跳出一道白亮亮的闪电，将整个平原照耀得一派辉煌。我欣喜万分又恐惧万分。我以为我偷窥了宇宙的秘密。我渴望辉煌的奇迹再次出现却又畏惧上苍的惩罚。如今，走在长满夹竹桃的小路上，我和她的眼睛天天相逢又倏然离去，我总会想起那一条遥远的地平线和那一道辉耀宇宙的闪电，我总会渴望，又喘喘不安。

那时候我刚刚读到了泰戈尔一首无题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  
当我们的目光在路上相遇的时候  
但是她走过去了，而这句话  
却象空船，在时间的每一阵波涛上摇荡  
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

它的朦胧和准确让我震撼不已，而且从此后日日都强烈地催动我甜美而陌生的心跳。我确信我爱上她了。这种情绪如此强烈，难以抑止，但是我却不敢承认它。大学整整五年，我甚至连和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日复一日的反修大辩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时都在告知我们，整个世界正在堕落并等待拯救，伟大的党所赋予的使命那么神圣而激动人心。任何儿女私情都是不可宽恕的罪恶。我只巴望着为党作一个“驯服工具”和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不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漫长的大学时代，整整五年，“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只能“象萤火般在我心头闪烁 / 在绝望的朦胧里 / 寻找它自己的意义”。三十年后，我到了深圳，我已经和我的过去彻底告别：“铁饭碗”、几十年工龄、职称和公房，开始真正以独立的个体面对整个社会的挑战。这时候，我才确信我被扭曲、异化和泯灭了的个人自信、尊严和追求已经涅磐，于是我回到重庆，大胆约会了她，并且向她表白了郁积几十年的情怀。我对她说，我想对你讲一个漫长的、无言而又无望的爱情故事，要听吗？她点点头，还是用大学时代我曾熟悉的眼睛微笑。这是一个七月的雨后，沙区公园满目青葱。隔着围墙，便是埋葬有433具冤魂的著名文革死难者公墓。静静的湖水中只有我们一只小舟。我给她背诵了泰戈尔的朦胧诗。这时，她突然问我：当初，你为什么不向我表白啊？那一年，她已经儿女成行，我也年届半百。

1967年一月的那个下午，当我得意洋洋地从解放碑走向学校，我觉得我是一个征服者，我觉得整个城市很快就会因为我们而得救。因此，当看见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同行（这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我觉得是在胜利凯旋时刻，突然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尴尬。我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个失败，因而只敢在日记上草草记了上面几行文字。如果需要补充，那就是：那一刻——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很滑稽地突然想起了革命小说、当年我的生活教科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雪筑路工地上，保尔。柯察金突然遇到了冬妮娅，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我连招呼都没给她打一个，便高傲地擦肩而过。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